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治心与 治世

——王阳明哲学的
政治向度

朱 承 著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治心与 治世

——王阳明哲学的
政治向度

朱 承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朱承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ISBN 978-7-208-07919-9

I. 治... II. 朱... III. 王守仁(1472~1528)—哲学思想—研究 IV. 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1609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

治心与治世

——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

朱 承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5 字数 186,000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7919-9/B·657

定价 17.00 元

出版说明

近十几年来，出版界愈益为生计所累，纯学术著作因印数较少，出版颇为困难。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高校招生的迅速扩大，整个社会的学术创造力大大增强，学术成果愈见丰厚。有鉴于此，本社决定策划出版《人文社科新著》丛书，意在给学术专著的出版开辟一个新的园地，使广大学者积年研究所得的学术心得能够嘉惠学林，传诸后世。

本社向以传播和译介学术文化为己任，为将优秀的学术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出版物而努力。出版一流学者的一流学术著作固然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但学术成果的价值常常需要时间的检验，凡能采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新颖、扎实的学术著作我们均竭诚欢迎。列入这套丛书的著作，或许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果有大有小，但这些成果都是逐步成长累积的学术大厦的必要组成部分。古人云，“积微成大，陟遐自迩”，我们相信，假以时日，这套丛书中一定会出现若干部对学术有重大贡献的不朽名作，这是我们和作者的共同期待。

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林林总总，决定了这套丛书的选题范围比较宽广。在丛书出版的初始阶段，取稿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为主，且暂不作分类，待到有一定的积累和规模后，或可按学科分类构成若干专题。

学术为天下公器，立言可达人生不朽。我们殷切期待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为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同做好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序

杨国荣

《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原系朱承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本书以政治哲学为视域，对王阳明的心学作了独特的考察。在心学的研究中，通常关注较多的是其心性之维，对心性之学所隐含的政治哲学内涵，则相对注意较少，朱承同志的这项研究，对于更具体地理解和把握王阳明的心学，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儒学的历史演化看，伦理与政治自始便非截然相分；无论是仁道与仁政的统一，抑或内圣与外王的并重，都体现了这一点。王阳明不仅在个人的实践方面上承了儒学的以上传统，而且在理论的层面对此作了较为自觉的思考。他以致良知立说，良知不仅仅以个体层面的心性为内涵，而且指向普遍的社会之序，从王阳明对致知的阐释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这里的事事物物既涉及道德之域，如人际之间的伦理关系等，也包括更广义上的社会政治之序；以天理

为内涵的良知，则相应地兼及道德意识与社会政治理想。所谓“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就是将良知推行、运用于道德与政治实践，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则意味着内在的良知展示并体现于伦常世界与社会政治之域，后者具体地表现为通过心的外化而建立合乎理想的伦理政治秩序。在形而上的思辨推绎之后，我们不难注意到心学的社会政治关切。

与致良知说相联系的是万物一体论。在王阳明那里，我们可以一再看到以下这一类的论述：“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答聂文蔚》，《王阳明全集》，第79页）“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25页）万物一体既指向天人之际，亦涉及人我之间。从天人关系看，万物一体意味着人与自然从有对走向无对；就人我之间而言，万物一体则以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为内涵。万物一体既被规定为行为的立场和出发点，也被理解为人所追求的理想之境：“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学问》，《王阳明全集》，第968页）所谈的虽是理想人格（君子、仁者、大人），但涉及的乃是天人之际、人我之间：“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从隔绝和分离走向沟通和融合；在这里，人与我、家与国的关系更多地呈现彼此和谐、统一的形态。如果说，人我之间展现了广义的伦理关系，那么，家国之辨则渗入了政治哲学

的内涵；二者的共同指向，则是社会成员以及社会机体的不同构成之间由冲突走向一致与有序，后者既表现为道德实践的目标，也展示了政治生活的旨趣。

王阳明确信，如果每一个体都能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将恻隐亲仁之情普遍地运用于天下之人，那么，从父子兄弟之间的伦理交往，到君臣上下之间的政治互动，都可以实现和谐统一：“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山川鬼神鸟兽草木，莫不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大学问》，《王阳明全集》，第968—969页）不难看到，在“万物一体”的思辨表述之后，蕴含着相当现实的伦理政治内容，而如何在社会伦理政治领域达到和谐有序，则是其关切的重心。当然，王阳明把恻隐同情之心视为达到万物一体的保证，认为通过亲亲仁爱之情的推而广之便可消除人我之隔，无疑过于乐观，而且亦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社会伦理政治关系并不仅仅涉及心理情感，与之相关的更有广义的社会结构、制度，交往过程的形式化的程序等等，对后一方面，王阳明似乎未能予以充分的关注。

一般而言，政治思想涉及政治生活或政治实践的原则、规范，政治哲学则要求进一步考察这种原则、规范本身所以可能的根据。王阳

明的心学尽管没有提供系统的政治哲学体系，但其以上思想无疑包含着这方面的观念，事实上，以良知担保现实伦理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以人我、家国的一体无间为伦理政治生活的原则和理想，并从形而上等方面对此加以论证，都不同程度地渗入了政治哲学的思考。

《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一书较为自觉的注意到了王阳明哲学的以上向度。通过分析致良知说、万物一体论、心性观念等所蕴含的政治寓意，作者从形上根据、社会理想、秩序运作的内在担保等方面具体地揭示了王阳明心学的政治哲学内涵。本书在不少方面叙述细致，注意把握所论对象的逻辑思路，并从理论上分析其得失，对所讨论的论题作了具有一定新意的论述。尽管本书对政治哲学理论内涵的阐释，还可进一步深化，对王阳明心学的历史影响，也有待更具体的梳理，但作为青年学子的探索之作，它无疑展示了良好的学术开端。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拓展与推进王阳明心学的研究。

2008年1月23日

目 录

序	杨国荣 1
导论	1
一、基本问题的提出	1
二、“政治向度”的理解	5
三、全书脉络的呈现	13
四、研究方法的说明	21
第一章 王阳明的政治关怀	24
一、为学——挑战朱学正统	27
二、为政——维系统治秩序	39
三、为教——教化社会风俗	48
小结	56
第二章 万物一体与三代之治	59
一、万物一体：形上致思路径下的人间秩序	62
二、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	75
三、“满街人都是圣人”	85
四、王阳明理想政治学说的继承	95

小结	103
第三章 化治世为治心	106
一、仁政与礼治	107
二、尽心与治平	118
三、心即理、心上用功与政治正当性	127
四、治心的意义	134
小结	144
第四章 良知与政治	147
一、良知作为准则	149
二、良知学说的理想政治效用	159
三、良知学说与近代政治精神	166
小结	172
第五章 王阳明哲学政治向度的历史回应	176
一、王艮和李贽对王阳明哲学政治向度的发挥	177
二、以心挽劫：化治世为治心的近代思想呼应	195
小结	205
附录 去知识以成德性——王阳明的格物说	209
参考文献	221
后记	232

导 论

一、基本问题的提出

在王阳明的哲学思想里，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他将儒家道德伦理学说的形上本体归之为“心体”。“心体”的确立使得王阳明哲学致思路向首先指向内在的心性，所以王阳明哲学应该被视之为心性之学，或者说内圣之学。然而儒家哲学的传统，从先秦以来又绝不仅限于心性和内圣，还天然的指向社会政治问题，治平天下、匡扶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和实现王道政治问题是先秦儒家首要关注之点。我们知道，心性之学总是和个体道德修养等私人领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治平天下是典型的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的公共话题，二者在儒家思想传统里向来并行不悖，内圣外王兼而成之也从来都是儒学思想家的理想之境。

在儒家学说里，个体的心性修养最终还是指向治平天下，无论是孔子的“修己安人”、“修己安天下”，还是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以及荀子的“劝学”、“修身”到富国强兵、君臣王霸，都乐于将个体的心性修养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可以这么说，心性和政治的不可分离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当儒学发展到明代心学的形态时，在以心性哲学为主要特质的王阳明哲学里，心性问题和政治问题可以共生

吗？或者说，在以心性讨论为主题的王阳明哲学里，政治何以可能？如果政治之向度在王阳明哲学里是可能的，那么其政治向度又是如何展开的并具有何种意义？本书的讨论就是围绕着上述基本问题而进行的。

对于王阳明哲学的研究，远的不说，即使是从中国哲学学科化以来的不足百年的时间里，就受到近现代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对王阳明哲学的研究和对朱熹哲学的研究，一起成为 20 世纪宋明新儒学研究的主要关注领域。这其中，产生了诸多卓越的研究成果和富有特色的研究范式，这些成果和范式对于王阳明哲学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以阳明学为论题的研究成果更是蔚为大观。就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近几十年来，以阳明学以及阳明学派为对象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外计有多种，从研究者的切入角度来看，对阳明学的研究大约呈现出两种主要的致思路径：

一是以王阳明本人、阳明学派哲学观念的发展流变为主线的哲学史研究或理论阐释，如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中关于王阳明哲学的论述，邓艾民的《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沈善洪、王凤贤的《王阳明哲学研究》，方尔加的《王阳明心学研究》，杨国荣的《王学通论》、《心学之思》，陈来的《有无之境》，吴震的《阳明后学研究》，钱明的《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朱子学与阳明学》、岗田武彦的《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等等，这些著作倾向于从内在理路上对王阳明哲学予以阐释，在理论层面对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哲学思想进行逻辑重构，倾向于从哲学观念出发来解释王阳明哲学，重在讨论王阳明及其后学本身的哲学问题及其在宋明理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

二是以阳明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及其对政治社会的影响为主题的思想史研究，如稍早的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论及阳明学

的部分,新近何俊的《西学与晚明思潮的裂变》,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邓志峰的《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吕妙芬的《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中国近代思想的挫折》、沟口雄三的《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则倾向于将阳明学作为中晚明的一种社会思潮和思想运动来理解,往往是结合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政治环境、思想背景来对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哲学思想展开研究,重在发掘阳明学之于当时及后世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生活的意义。另外,以阳明学派中个别哲学家和分支学派为论题的成果更是不可胜数,对于王阳明及其后学的研究一直是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上述这些成果的出现,为我们继续研究阳明学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作了厚重的学术积淀。然而,由于阳明学本身以心学名于后世,加之现代新儒家树立的从道德形上学角度和心性哲学的角度研究宋明理学的典范性影响,使得对阳明学本身所蕴含的政治向度关注的不够(除了思想史、政治史的研究可能提到阳明学派对于明代政治以及近代中国政治有所影响之外)。关于王阳明与政治的关系,研究者总是习惯于从王阳明本人与中晚明现实政治关系的角度去考察,这其中包括王阳明一生的政治事功、王阳明在政治活动中体现出的政治谋略以及阳明学作为一种思潮在晚明社会的政治影响等等,而对王阳明哲学本身里蕴含的儒家政治哲学的向度关注较少。虽然,在中国哲学学科化以来的一段时期内,王阳明哲学曾以唯心主义哲学的面目和中国封建政治联系在一起,在批判王阳明哲学的唯心主义时,批评家们也不时提到王阳明哲学与封建制度、专制统治、阶级压迫甚至民族矛盾的关系。一般而言,这种批判都倾向于指摘王阳明哲学作为一种唯心主义思想对于封建政治制度和封建纲常秩序起到了维护的作用。这里虽

然涉及了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但是基于政治立场、阶级立场的批判过多，而对其哲学思想本身展开深度解析甚少，这种批判大多因应一时之景而流于泛泛之谈。也就是说，对于王阳明哲学的政治批判，并没有从学理角度来呈现王阳明哲学同政治的关系，而只是从阶级分析的立场上来评价王阳明哲学的政治维度。从以上简单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真正在哲学意义上，对阳明学的主要思想、基本概念等所呈现的政治维度作出理性分析和理解的研究工作，还不多见。

纵观近年来的王阳明哲学研究成果，我们大致可以认为，王阳明哲学主要是被定位在心性哲学、精神哲学的层面上，这一研究角度是阳明学研究的主流和重点。一般而言，心性哲学主要是在解决个人的安身立命问题，涉及的领域局限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上，而这些都是私人领域的“修己”问题，没有涉及社会政治问题，即不关涉“安人”一面。前文已述，儒学除了“修己”的一面之外，还有“安人”的一面，也就是说，在儒家哲学和儒家学者心目里，个人的心性修养始终是和社会政治问题紧密相联的。那么，被定位为心性儒学的王阳明哲学有没有“安人”的社会政治性意义呢？政治的问题在王阳明哲学里是否可能？王阳明哲学里涉及了哪些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在王阳明哲学体系里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另外，阳明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方其盛时，在王门后学的推动下，对中晚明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前辈学者已作了诸多描述。而且，中国近代以来，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政治人物都被认为受到阳明学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甚至日本的明治维新也被认为发源于王学的思想先导。这种影响，我们从上述人物的著作或后人的研究成果里，都能感受得到。那么，除了阳明学革新儒学的那种不拘一格、勇于进行理论革命的精神气质之外，上述人物还从阳明学中受到了何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影响

呢？换句话说，阳明学中包含了什么样的政治维度，使得这批以政治或社会革命为志业的近代翘楚人物对其青睐有加呢？时下，在现实政治领域，由于建设政治文明的时代风气在新世纪初期大张其道；在学术研究领域，由于罗尔斯、哈贝马斯、施特劳斯等西方政治哲学家的影响，中国学界的政治哲学研究也方兴未艾。当前中国学术界政治哲学研究领域分布极为广泛，从研究的哲学家来看，上至苏格拉底下至阿伦特、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从研究的问题来看，涵括正义、公平、民主、国家、自由、哲学家与社会、政治权力的正当性等与人类政治生活相关的政治哲学问题。同时，也有许多研究者开始把研究视线投到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丰富的思想资源上来了。当然，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下来观照中国的思想资源，目前的研究可能仅仅只是在探索阶段。但毋庸置疑的是，决不能因为其不成熟而否认这种研究路径的意义。那么，具体到王阳明心学这一古典的思想资源，我们以“政”观之，它能给我们当下思考的政治哲学问题以何种启发？或者说，我们能从王阳明心学这一颇具心性特色的中古时代的哲学流派中获取什么样的精神资源来丰富时下的政治哲学研究？

上述所罗列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指向我们在开端处提出的同一个问题，即政治在王阳明哲学里何以可能？也就是王阳明的心性哲学里是否蕴含着政治的向度？如果王阳明哲学本身具有政治的向度，那么这一政治向度又是如何展开和呈现的？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以政治哲学的视角对王阳明哲学予以开掘，超越心性的致思路径，探讨王阳明的政治运思和潜在于其哲学思想里的政治之维，从而呈现其政治的向度。

二、“政治向度”的理解

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对社会和人类生活十分关注，而政治作

为关涉社会 and 人类生活的主要现象，自然也就成为哲学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哲学思想和哲学家也总是诞生于政治社会之中，并以政治社会为思想背景和生活背景。^①哲学和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得我们在讨论哲学问题时，无法回避政治的视角。而我们要想获得对政治问题的通透认识和根本理解，也总是要追溯到哲学的层面。当然，限于本书的立意，我们这里仅在哲学的立场上来看待哲学和政治的关系，而把从政治的立场来看待哲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搁下。

哲学是人类对于社会和自然现象的本质以及相互间关系和规律的抽象概括，是对社会和自然现象中蕴含的所谓“性与天道”的追问。从起源上讲，哲学源于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惊奇和对于社会生活的忧患，在惊奇和忧患中，哲学开始了它的问题之旅。哲学从对社会和自然的发问开始，又以向世人讲清道理的姿态显现，而哲学的终极目的是通达智慧之境。从哲学和政治的关系角度看，政治则是作为哲学问题的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关涉着每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成长与完善，政治是哲学沉思的对象之一。哲学家生活在政治社会之中，现实政治的境况直接作用到哲学家本人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一般来说，鉴于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和体知，哲学家们都深谙良好的政治对于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哲学家总是不约而同的对政治问题进行哲学沉思，哲学家对于政治的关注，更加使得政治成为哲学的一个主题。哲学和政治思想无法完全分离，哲学家与政治也无法脱离

① 哲学家与政治社会的这种关系，也正如柏拉图所说：“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一个哲学家是不可能最大成就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国家里，哲学家本人才能得到充分的成长，进而能以保卫自己的和公共的利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248 页。

干系，哲学总是关怀着现实政治，并企图通过哲学家本人对政治问题的理解、以哲学的方式解读政治生活，告诉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社会政治生活、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好的等问题，同时为人们勾画理想的政治生活，描绘可能的未来生活图景，通达解决政治事务、实现良善生活的智慧之境，简单来说，这就是哲学的一种政治向度。

在哲学中反映政治，对政治问题予以哲学层面的思考，也可以称之为哲学的政治向度，其表现形式指的是以哲学思考的方式（也即形上或抽象的层面）而不是就事论事的方式来探索政治问题，来追问什么是良好的社会生活，如何实现和维持人类的良好生活等等问题；或者指在哲学思想中渗透着对政治的关怀，以哲学的“微言”来反映政治的“大义”，也就是哲学思想本身可能没有明确的通过提问回答的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但是包含着政治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哲学家往往将关乎政治问题的思考隐藏在哲学问题的讨论里面，这正如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言的隐微书写（the esoteric teaching），只有带着政治的关怀反复阅读和琢磨哲学文本，才能从哲学中领会政治的“大义”。

哲学的政治向度是哲学家对政治社会的直接和间接的教导，通过对哲学文本字面的理解即可得到哲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以及对良好生活的设计和构想。哲学家通过讨论人类政治问题，直接或间接的表达对于政治问题的认识和分析，回答良好的生活何以可能和如何达到。哲学的政治向度还表现在，哲学以讨论本体论、道德观以及宗教信仰的方式来为社会政治构筑哲学、道德和宗教基础，在哲学文本中可能看不到哲学家对于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府组成等具体政治问题或政治操作技艺的认识，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哲学家关于道德与政治、人性与政治以及何为良好生活等等问题的分析，这些分析恰可以